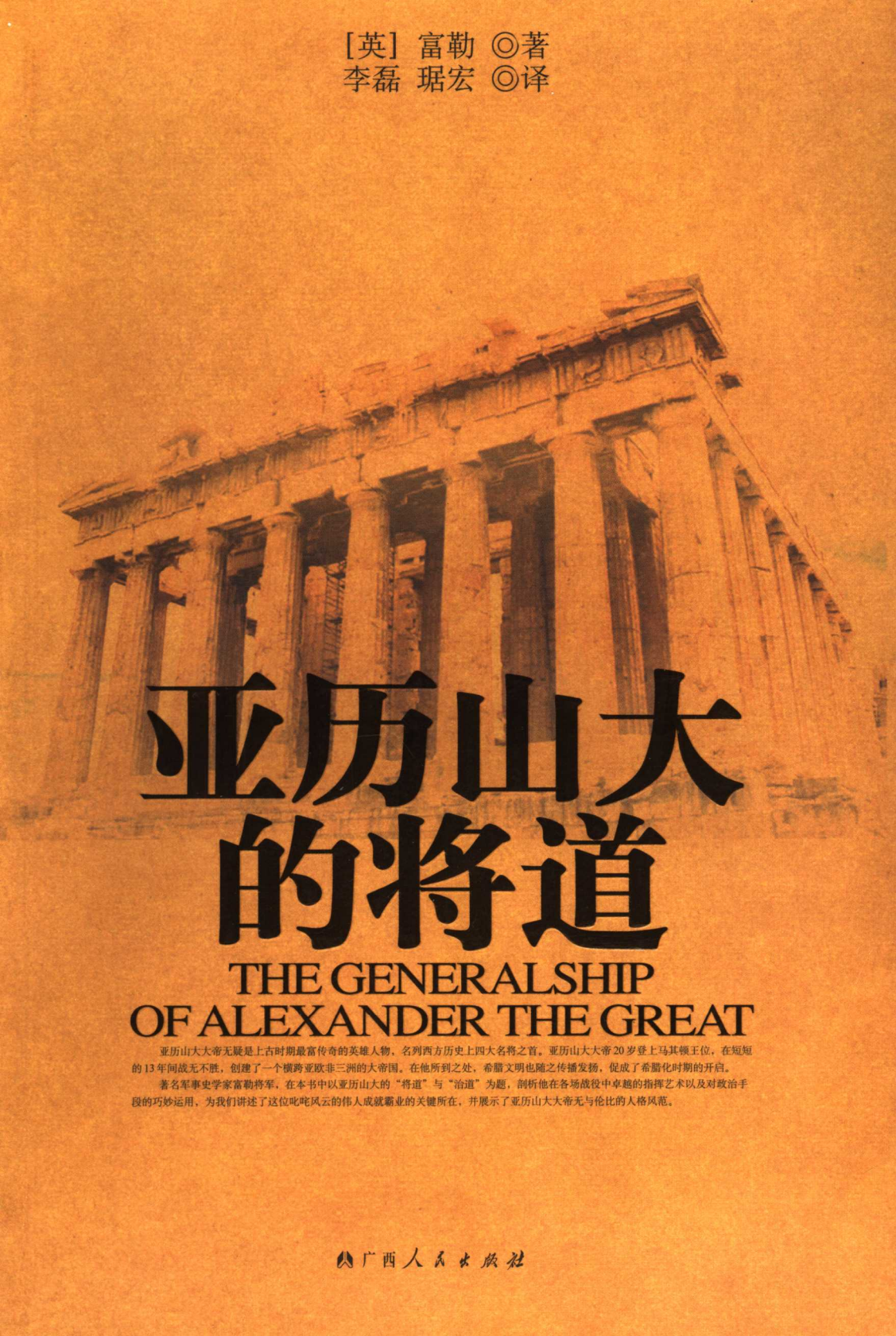


[英] 富勒 ◎著
李磊 琚宏 ◎译



亚历山大的将道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无疑是上古时期最富传奇的英雄人物，名列西方历史上四大名将之首。亚历山大大帝20岁登上马其顿王位，在短短的13年间战无不胜，创建了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在他所到之处，希腊文明也随之传播发扬，促成了希腊化时期的开启。

著名军事史学家富勒将军，在本书中以亚历山大的“将道”与“治道”为题，剖析他在各场战役中卓越的指挥艺术以及对政治手段的巧妙运用，为我们讲述了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成就霸业的关键所在，并展示了亚历山大大帝无与伦比的人格风范。

广西人民出版社

亚历山大的将道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英] 富勒 ◎著
李磊 琚宏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历山大的将道 / (英) 富勒著; 李磊 琚宏译.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 5

ISBN 7-219-05583-8

I. 亚... II. ①富... ②李... ③琚...
III. 亚历山大大帝 (前356~前323) —生平事迹
IV. K835. 4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17945号

责任编辑 袁铭

YALISHANDA DE JIANGDAO

亚历山大的将道

(英) 富勒 著 李磊 琚宏 译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网址 <http://www.gxp-ph.cn>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 640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数 208千字

版次 2006年6月 第1版

印次 2006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9-05583-8/I·902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20-2004-060



内容简介

亚历山大大帝无疑是上古时期最富传奇的英雄人物，名列西方历史上四大名将之首。亚历山大大帝20岁登上马其顿王位，在短短的13年间战无不胜，创建了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在他所到之处，希腊文明也随之传播发扬，促成了希腊化时期的开启。

著名军事史学家富勒将军，在本书中以亚历山大的“将道”与“治道”为题，剖析他在各场战役中卓越的指挥艺术以及对政治手段的巧妙运用，为我们讲述了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成就霸业的关键所在，并展示了亚历山大大帝无与伦比的人格风范。

作者简介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英国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英国奇切斯特。1899年开始在英国军队中服役，参加过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国远征军赴法国参战，1916年担任坦克军参谋长，1922年担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1926年任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军事助理，1929年任旅长，193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33年退役。

此后，富勒致力于军事历史研究和军事理论著述。他一生共出版了45部军事著作，其中有不少被英国陆军军事学院列为经典著作或选作教科书。他的很多著作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其不朽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更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1963年，富勒获颁英国三军学会的最高荣誉奖章。

1966年，富勒逝世，享年88岁。

责任编辑：袁 铭

装帧设计：海云间装

daoji2005@yahoo.com.cn



宗豪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利路23号远洋明珠大厦东座1903信箱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茉莉园610-3-102室

服务专线：广州 (020)23830753

北京 (010)84958376

E-mail: zonghao_gz@163.com

亚历山大的将道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目录

1 序 言

5 第一篇 记录

- 第一章 背景/7
- 第二章 马其顿的陆军/27
- 第三章 亚历山大/40
- 第四章 战场/51
- 第五章 战略述要/61

115 第二篇 分析

- 第六章 亚历山大的四大会战/117
- 第七章 亚历山大的围城战/156
- 第八章 亚历山大的小战/170
- 第九章 亚历山大的治道/203
- 第十章 亚历山大的将道/216
- 结 论 历史的价值/240

序言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我第一次对亚历山大大帝发生兴趣是在1917年,当时我正在法国前线上新成立的战车兵团中服役,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读到了道奇上校(Col. T. A. Dodge)所著《名将集》(Great Captains)中,有关亚历山大的那两卷书。我发现亚历山大的作战方式非常近代化,从他的会战中我可以学到许多经验和教训,并且都可以应用到战车作战上面。1923年,我到康贝里(Camberley)参谋大学担任教官职务,我的工作之一即为讲授军事史,我没有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斯通沃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的战役来当做讲授的主题,因为自从1900年以来,这些战役经常被采用,已经成为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题材。我决定要让我的学生学到一点对下次战争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而讲述亚历山大的战役就是最好的选择。结果,形成了一套约二十次的讲稿,我想那应该是非常外行的,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任务,使我除了以道奇的著作和亚利安(Arrian)的《亚历山大东征记》(Anabasis of Alexander)为根据外,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任何深入的研究。但我发现我的主题是如此的有趣,又是如此的近代化,所以在1925年决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后,为亚历山大写一本专著。这并不是一本亚历山大的新传,因为关于亚历山大的传记很多,本书的侧重点在于对其将道的分析。据我所知,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书是专门研究这个主题的。我一直等了很久才开始动手写作,因为自从1925年以来,关于亚历山大又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出现了。

不管读者是一个学院派的学者也好,或是像我自己,仅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也好,都可能会发现下述一个重要事实。亚历山大与恺撒完全不同,恺撒有自己的著作,也有西塞罗(Cicero)等人的著作可供参考,



但关于亚历山大却没有任何原始资料可供研究。有许多话据说是亚历山大曾经说过的，还有一些信件据说也是他遗留下来的，但这些话和信件多半真伪难辨。不过，除了这少许的断简残篇之外，从亚历山大有生之日算起，直到罗马共和国末期和罗马帝国初期为止，中间三百年内几乎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著作。此后，陆续出现了狄奥多拉斯·希卡拉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1世纪），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2世纪），寇修斯（Rufus Curtius，公元1—2世纪）和亚利安（公元2世纪）等人的历史著作。亚利安的历史著作是最杰出的，因为它是以现在已经失传的古史为根据的：一种是托勒密（Ptolemy）的著作，他是亚历山大的名将之一；另一种是亚里斯托布拉斯（Aristobulus）的著作，他是地理学家，也是亚历山大的主要技术专家之一。

在罗马人的历史之前，除了托勒密和亚里斯托布拉斯以外，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著作。可是除了断简残篇以外，现在已经没有完整的书存在。这些书的作者似乎多数属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学派或是斯多噶（Stoic）学派：前者痛恨亚历山大，因为他曾经杀了他的史官卡里希尼斯（Callisthenes），而卡里希尼斯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后者同样憎恨亚历山大，在他们看来，亚历山大是一个暴君，与其理想中聪明仁厚的统治者完全不同。这些具有主观偏见的历史使亚历山大的名誉许多年来都被虚伪和虚构的烟幕所遮掩着。直到最近，这种烟幕才被澄清，这应该感谢威廉·塔恩（Willian Tarn）爵士。照我个人看来，塔恩对于有关亚历山大的史料来源已做了最彻底的考查，我曾征询过某些学者的意见，他们也都支持我的看法，所以我决定采用他的资料。我也深知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同意他的某些结论；但是我不是一个学者，而学者又都是喜欢标新立异的。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自己最好还是接受一家之言当做指导，而不要卷入几种辩论的漩涡中，因为是非曲直是我所不能判断的。

与此有关的，又有当时文献的可靠性问题。这是每个下级军官所知道的，报纸上对于他所曾参加过的某次战斗所作的报道，往往几乎与真相完全不相符。对于官方的史书与报告也是一样，因为经过了慎重的选择和删节，几乎可以把真相完全掩盖。想从当代的文献中发掘事实的真

相,都已经够困难了,所以一个学者,不管他是多么的诚实和博学,要想考证两千年前的史实,其困难都是可想而知的。这并不是说他不能够证明某一种说法是错误的、不可能的,或被为后世的人曲解了,而是说当某一可靠的史学家,例如亚利安,说亚历山大曾经做过什么,或说过什么,但那却似乎是不可靠的时候,就应该根据亚历山大的已知性格和行动来判断真伪,而不应只是尝试发现其来源是否可靠——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办法。有时,甚至于不可靠的历史学家也一样能提供可靠的史料。

很幸运,在对于亚历山大将道的研究中,我却没有必要事事请教人家,因为战争的艺术,尤其是它的要义,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中还是与今天一样,我在第十章中将有更详细的说明。假如我们不能判定那些经典权威著作的可信度时,就可以根据这种艺术来考验亚历山大的军事能力。在经典性的史籍中,由于那些作者缺乏地图、作战命令和战斗报告等资料,所以对于战术及其他的细节往往是讲不清楚,用这种“想当然”的方法就都可以将其补充起来。这并不是说可以保证其正确性,而是说,一旦对于一位将军的性格和才能已经有了判断,他的目标和问题也已经明了。其作战的条件也已经清楚,那么对于某种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即可能获得一种高度可靠的想象,即便是两千年前的历史也是如此。

我把这一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记录,第二部分是分析。第一部分对于作为政治家和军人的亚历山大的经历做了一个简单扼要的叙述,并给出了其背景。第二部分则对于亚历山大的大会战、围城战和小战加以详细的分析。最后,对于亚历山大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将军的价值给出了评价。我相信若能对于历史上的每一个名将,都能照这样写一本书,再把它们浓缩成一本单独的书,那么对于将道也就可以产生一本“无价之宝”的教科书了。这种工作至今还没有人做过,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因为在19世纪开始时,拿破仑就曾奉劝所有想变成一个成功的将军的军人们,应该一读再读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屠云尼、尤金和腓特烈等人八十三次战役的记载,并以此为范本。他说:“这是变成一个名将并发现艺术秘密的唯一途径。”



亚历山大的将道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第一篇 记录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第一章 | 背景

城市国家的崩溃

当历史上被称为希腊人的印欧民族 (Indo-European) 部落们, 穿越巴尔干的山地, 移入较肥沃的谷地时, 他们就构成了许多农业社会的小圈子, 彼此间的联系也被中断了。最初, 每个村落成群地聚集在领袖的设防据点附近。这种据点就叫做“卫城” (Acropolis), 但是后来, 为了提高安全性, 这些村落也被包括在城墙之内, 与其卫城共同构成一个要塞化的城镇。这就是“城市国家” (City-state or polis) 的起源, 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型的“民族国家” (Nation)——在克里特岛上就有五十多个这样的小型城市国家。在这些国家中, 其公民权的共同基础是原有征服者的子孙: 公民享有一切的财产, 行使一切的政治权利, 担负一切的军事义务。在这个“史诗时代” (Heroic Age) 中, 社会的核心是“部落” (Tribe) 与“氏族” (Clan)。尼斯托 (Nestor) 对阿伽门侬 (Agamemnon) 说: “用部落和氏族来区分人类, 部落与氏族之间可以互相协助。”

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具有主权的单位, 有自己的国王、法律、军队和神灵, 每个公民仅向自己的城市效忠。只有四个区域对于这个通律构成了例外, 每一个都大致构成一个地理单位。斯巴达 (Sparta) 和阿哥斯 (Argos) 两个王国, 它们联合起来占了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 的相当一部分土地; 由雅典人 (Athens) 所统治的阿提卡 (Attic) 半岛; 还有波提亚 (Boeotia), 那里的城市国家虽尚未被吞并, 但却已接受底比斯 (Thebes) 的统治。



荷马时代的制度是国王虽为部落的领袖，但却要受到族长（Chiefs）会议的指导，而他的决定也要经过市民大会的批准。国王是主祭者、大法官和最高军事统帅，他自称为神的后代，并有亲兵的保护。

希腊城市的政治生态不是无止境的城市间爆发的战争，就是城墙之内的内乱。柏拉图（Plato）曾指出，这些城市间的战争大部分都是由于人口过多引起的，有时移民也可以使局势缓和一下。这是一种由永无休止的野心、个人的妒忌、党派的纷争和牲畜的劫夺所构成的生活。在海洋上，由于商业的竞争，也经常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公元前7世纪，诗人阿尔齐罗恰斯（Archilochus）对于海上自由船的生活曾有下列的描写：“我的长矛中有肉有酒，当我饮食时，就卧在我的长矛上。”

因为公民是以战争为生的，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兼顾和平的职业，这些工作就只好交给农奴、奴隶和异邦人去担负。公民军人（Citizen-soldier）与农业劳动者的划分，形成了两个主要的阶级：贵族与农民，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就变成了城市政治中的决定性问题了。在公元前8世纪之后，当共和国代替了正在没落中的部落王国时，从这种阶级斗争中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政府——即所谓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君制等。不过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除了斯巴达已经采取了一种双君王政以外，其他的希腊城市没有一个能够发展出一种稳定的政府形式。

在城市之间，除了共同的语言和伟大的体育比赛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联系了。伟大的体育比赛是在宗教仪式之下举行的，所有的希腊人都有资格参加。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林匹克大会（Olympic Game），创始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每四年举行一次，以祭献奥林匹亚的宙斯（Olympia Zeus）为目的。此外还有皮西亚大祭典（Pythian Games），以祭献德尔菲的阿波罗（Apollo of Delphi）为目的，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这些事务就是由安费克托尼会议（Amphictyonic Council）来管理的。仅仅当泽尔西斯（Xerxes，公元前485—前465）指挥的波斯大军逼近时，才使所有的城市国家感到极大的威胁。这个威胁虽在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的萨拉米斯（Salamis）和普拉提亚（Plataea）两次会战中宣告解除，但却多少使希腊人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爱国心，并促成雅典帝国的兴起，也促成了伯里克利（Pericles）的统一梦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1—前404)中,雅典帝国被击垮了,其统一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诚如巴克爾爵士(Sir Ernest Barker)所说,雅典和它的同盟国,都同样受到城市国家思想的束缚,而不能把许多民族联合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使其具有共同的公民资格。因为雅典的公民资格要求必须土生土长,并充分参加雅典的局部生活方式。同样的,其他城市也是同样重视其公民资格。他又说,希腊人对于城市的崇拜已经变成一种宗教,这种宗教造成了雅典帝国的崩溃。反之亚历山大的大帝国也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不过却是所有城市共同崇拜一个神意的统治者。

伯罗奔尼撒战争几乎把所有的城市国家都卷了进去,对于希腊政治体系是一个极大的灾难。由于毁灭了雅典帝国,也就推翻了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权力平衡。公元前386年,斯巴达与波斯的同盟签订了可耻的《国王和约》(King's Peace),又称为《安塔西达斯和约》(Peace of Antalcidsa),由阿尔塔泽尔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公元前404—前358)强迫希腊各国接受。根据这个条约,亚洲的希腊城市和塞浦路斯岛都划给波斯。而斯巴达在希腊境内的领导权则被承认,任何国家若不接受这个和约,波斯就会用武力来镇压。所以波斯的“大王”(Great King)变成了希腊的仲裁者,具有永远干涉的权利。

同样重要的,这个希腊时代的“三十年战争”,也在城市之内散播了崩溃的种子。它不仅毁灭了阿提卡的农业,使千万的农民变成了失业者,而且由于连年征战的结果,作为城市制度的支柱的古老民兵制度也随之而崩溃了,长期的服役使军人变得日趋于职业化。虽然早在波斯人侵入之前,冒险成性的希腊军人和水手就已经接受外国君主的雇用,而早年的希腊暴君也用佣兵来当做亲信的卫士,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们才有大规模就业的机会。到了公元前4世纪开始时,希腊公民式的民兵,就完全为职业性佣兵所取代了,后者变成了希腊战争中的典型现象。这又产生了两种结果:(一)佣兵并不效忠于任何城市国家,谁的价钱出得高,他们就帮谁卖命。有了这种工具,民主也可以用暴力来推翻。(二)因为大家都竞用佣兵,所以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波斯陆军中的多数步兵都已经是由希腊佣兵组成。公元前401年,为了征伐兄长阿尔塔泽尔西斯二世,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招募了一万三千余名希腊籍佣兵,



其中有半数以上是为饥馑所迫的灾民。在居鲁士失败后,这支军队的残部由色诺芬(Xenophon, 公元前430—前354)率领,退回到托德(Troad),变成了职业军人。塔恩爵士说:从他们起,在希腊历史上产生了一个与城市国家分离的新世界——一个佣兵的世界。

修昔底德(Thucydides)告诉我们,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的公民是准备为了雅典的光荣而冒险和忍受痛苦的。但是到了后来,逐渐依赖佣兵保卫这些城市,一般的公民开始感到军事服役是一种负担,他们变得爱好和平,并专心于工业和专门职业。诚如巴克尔爵士所说,“城市已经不再是一种高贵生活的结合,而变成了一种商业性的组织”。

哲学家的改革

城市国家精神的崩溃与城市间连年战争的破坏结果结合在一起,动摇了希腊人的意识,使一些哲学家纷纷发言。他们也像18世纪的伏尔泰、卢梭、康德等人一样,开启了一个启蒙时代,但这不仅不能使城市国家的体系复兴,反而增快了其残余部分的朽坏。这些自命为改革家的人们中,最杰出的是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469—前399),柏拉图(Platon, 公元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前322)。

这些哲学家所不能了解的,是问题并不在于依照一种理想的城市制度来改革各城市国家的宪法,而是要扩大国家的范围,把所有的希腊小国都合并成为一个整体。苏格拉底为三大贤中最早的一个,因为他本人不曾留下任何的著作,所以我们对于他的一切都是从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斯多芬尼(Aristophanes, 约公元前448—前388, 编按:希腊最杰出的喜剧大师,在《云》(Clouds)一剧中讥讽苏格拉底)的记录中得来的。他自认是奉天命来教育世人的,色诺芬告诉我们,他像“圣女贞德”一样,受到神意的指示。他冗长的问答语录足以混乱听众的心灵。假如柏拉图的著作足以正确地代表其观点,那么保守性的雅典人认定他在妖言惑众、毒害青年的看法也就似乎不无道理。

假如我们翻阅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等著作,即可以明了

这个道理，那上面曾经说明苏格拉底的城市国家理想建构的草案，也是一切改革指向的天意典型。

在这种理想的自保、自足和自制的城市国家中，公民分为两个阶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前者叫做“保卫者”（Guardians），是哲学家兼军人，而且有男有女。后者则为普罗阶级，包括一般的农工商等劳动者都在内。因为保卫者必须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公义方面，所以他们不准有私产，必须生活在一起，在公共食堂中用膳，也没有金钱，并受普罗阶级的供养。他们的妻子也是共有的，婚姻受到管制，儿童都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这样才能使国家变成一个大家庭。

对于一般的平民，也丝毫不准有个性的表现。他们的婚姻，被定为男子在30到35岁之间，女子在16岁到20岁之间，必须结合。这种控制是为了使人口可以维持不变的水准。他们在国内设有安全委员会，并实行秘密警察制度，其任务即为捕捉异端。到处都是特务，一切的错误行为都会受到检举。

所有40岁以下的公民绝对禁止出国，40岁以上的人也必须经过批准，而且在回国后，还要向他的后辈们说明外国的制度是如何的落后。苟合的行为和饮酒都受到禁止，任何未经警察检查的诗句，都不准传诵。不准借债，国内货币也不准输出。任何公民也不准有私人的信仰，否则格杀勿论。

柏拉图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都善良，而且不准有不善良的思想。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目的就是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把每个城市变成一个神圣的蚁穴。

亚里士多德比较温和。他虽然也是一个对城市国家所代表的希腊生活的坚定的信仰者，但他所主张的却是改革而非革命。他虽然认为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是不合实际的，但他也认为任何“公民”都不应从事于劳动，因为他们必须要有空闲的时间，来执行对国家的义务——劳动耕种都应由奴隶负责。他也像柏拉图一样，认为野蛮人是天然的奴隶，并且认为希腊人是应该统治野蛮人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具有天下一家的理想，只有雅典的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曾经指出了一条比城市国家更